

又天週報

第十五號 2008.3.10 - 2008.3.16
2007.3.22 出刊

發行人：胡又天 電郵：b90103016@ntu.edu.tw / youtien@pku.edu.cn 網誌：<http://blog.pixnet.net/youtien>



迎春開，春天到。這叫迎春花，在現代化校園的環境中卻沒多好看；現在的春天也是這樣。

回家投票

「下週我請一次假，我要回去投票。」

十五日週六，搭遠東航空經濟州島轉機回到台北了。回家後零碎的文字頗寫了一些，但幾天都沒有把週報寫好。今天二十二日要投票了，不該再拖了。現在先把一篇中國現代史研就課的補充討論發給大家；台灣選情，請等下期（十六號），幾天就到。

· 「國民外交」及其史學史補充討論

「國民外交」及其史學史補充討論

羅志田老師、各位同學：

十一日（週二）我在「中國現代史研究」課上的報告，由於準備倉卒，對基礎史實、延伸議題的掌握不足，加以表達能力和時間的限制，因而沒能把討論開展完善，也很有些對不起我引述的學者與論文。這裡願以此信為我的想法作些補充，也希望能得到老師與各位進一步的指教。

* * *

江山同學報告杜贊奇《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就百年來中國民族國家之建構提出了「什麼是民族」「民族在哪裡」的問題。對此我的理解是：現在大家已經比較接受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這種論述；這樣，當你再面對「我們是中華民族」一類要把你裹進某個群體（通常以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和國家為代表）的話語時，你就有了從前提上審核他的權力，可以提出你自己對「民族」的想像與他抗衡，也可以「免疫」而後已，不承認他自稱的正確就算了。

我認同這種觀念，我也願意推廣它，但這並不代表我想倡導大家否認民族、否定歷史敘述、或和政府對著幹。我的想法是，經由肯認「想像的共同體」論，身為並且作為個體我們，可以和民族、國家達到一種「和而不同」：我還是願意遵守當今的法律，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這個中國的定義我說了算），唱我們的民族歌曲、愛國歌曲，為我們史上的先賢、英烈感動。然後，當「民族」與國家要祭起歷史與什麼主義來裹挾我、動員我的時候，我可以充份諒解而平心靜氣地說：你這樣的民族主義動員只能達到「同而不和」。

民族主義下的「同而不和」，在今天許多國家，都可算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吧。中國的國

力與地位上升了，應該也能有一點餘裕來檢討這個問題了；然而，這關係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合道性基礎，而且台灣問題還沒解決，所以要從頭審視這些，在黨和國家應該是有許多障礙的——台灣也一樣，獨派一方面抗拒中國、不與中國「同」；一方面著力建構所謂「台灣主體性」，裹挾人與他「同」；做不到，也要在表面上經營出這種形象。

我認為這些「同」的努力與意圖都是「和」不了的。不論「和諧社會」或「和解共生」，其核心思路不外「以我為和」，這是政府、政黨與政客的侷限；有害於他者，他就要用「同」的方法去和諧掉、遮蔽掉。而我以為「和」的意思不但有和諧，也應是數學加法上總和的和。

我所認知到的學術的天職，就是那真正的總和為依歸，「雖不能之，心嚮往之」，工作也力求逼近之，把被扭曲、遮蔽的事實還原，以供大家校正自己的認知，以及今後的方針。我想，杜贊奇先生說要「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用意也就在此。這也就是「施於有政，是亦為政」：雖然許多學者自覺地和政治拉開距離，但我從其論著裡也就可以看出他們的關懷——即使本人沒有一套鮮明、完整的政見（畢竟提政見是既難討好更難驗證的），其研究成果能成為參考的基準，也就是貢獻了。

那麼，該怎麼辦才好呢？

台大歷史系一年級「史學導論」課，有一本指定讀物：Keith Jenkins《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介紹後現代主義史學的意旨，是教人「從對確定性的欲望中解放出來」，我對這句話印象深刻。這裡，或許我們可以把它改一下，改成：「從對良好自我感覺的欲望中解放出來」。

可不可以，我們不必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政府和法律也不必是正義的，我們大方接受現實，也不去以生存邏輯以外的普世價值譴責誰的不公不義？——換句話說，對於國家、民族，我們可不可以解除「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必要性，解除對它的執著？

中華民族之建構，國魂之喚醒，精神之凝聚，不外是為了追求一種良好的自我感覺。於是我們奮發圖強，要革命，要發展軍事、經濟，要廢除不平等條約，要富強。於是，「富強」與「良好自我感覺」緊緊掛起了鉤，至今未已；追求這些，也就成了政治家的使命；國民黨與共產黨，因為要爭取在這些方面的代表權，所以必須是偉大、光榮、正確的。要偉大、光榮、正確有兩種辦法，一種是真的為人民去做這些那些，一種是在「人民」與「偉大、光榮、正確」的解釋上動手腳。

採取後一種方法，就會造成「同而不和」，而且為了捍衛這個「同」，政治與社會就會發生許多禁忌。然後，怎樣都沒法「同」過來的，就會被劃到「人民」的對立面，成為箭垛與髒水桶般的「他者」。

如果我們追求的是「和」，是思想自由，那就不該再把任何人、事排斥到「大我」之外。或許，這也就是「博愛」的真諦。這是我最近完成的一個思想跨越：貪官污吏也是公民，獨夫民賊也是人類；不論什麼立場、做出了什麼事的人，美醜智愚善惡，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學術的精神也是如此吧，只是不那麼強調情感。

杜贊奇先生說要「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或許用意也就在教人「從對良好自我感覺的欲望中解放出來」。

* * *

我選「國民外交及其史學史」為題，用意也在從中探討我們這一百年來對「自我感覺」的追求，與校正。

我十幾歲時對民初外交的印象，主要來自歷史課本、小說、散文，對北洋政府的描述都沒什麼好話；也看過《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顧對他的同僚如王正廷、王寵惠也沒什麼好話。這就給我一個感覺：北洋那些人都是揹了一大堆包袱的政客，行事也左支右絀，動輒顧忌，開不出什麼氣象。直到國民黨北伐，中國政治給人的感覺才有了些新氣象——雖然後來國民黨搞成了什麼樣子大家都知道，但那「新氣象」的「感覺」，至今也還是很確實、很強大的。

近年學界為北洋外交「翻案」，正面評價了當年外交家在困境中作出的成績，我的印象也為之動搖，覺得曹汝霖、章宗祥之流也沒有那麼不濟，還是挺有能耐的了。又讀到，北洋外交官自主決策的空間其實較大，外交官群體也相對與國內政爭保持距離，而顯現出了某種「職業」或「專業」的性質——我真要刮目相看了。

我很高興見到學界從務實的態度出發，重新評論北洋外交；我更高興「看到」一群超然於政爭、為中國（不論誰當家）謀平等、福利的外交家——而近年的史學把他們從教條式的、太簡單的民族主義中「拯救」了出來。（讀過蔡東藩小說《民國演義》，作者和注者一搭一唱，

把顧維鈞等外交家都描寫成巧言令色的油滑之徒，這也是一條史料。)

我喜歡看到這些，但當我意識到我喜歡這種敘述的時候，我就知道這裡面有問題了。如果我太想「發現」北洋外交的優勝，我很可能就會一時忘記他們的存在前提，忘記他們的上司是個傾軋嚴重、缺乏理想的政府，忘記這種「常識」。雖然「常識」可能是不正確的成見，在研究、學習過程中可以暫時放在一邊，但研究告一段落後，還是該把「常識」拿回來，以免過度強調歷史中某一不具支配地位的面向。

老師在講評時，問了我對幾位民國外交家生平的瞭解，便讓我再度感覺到自己基礎認識的不足，也讓我們重新確定了自己的關懷所在——人的故事。討論那麼多民族問題、主義問題，都是為了能讓我們更理解那些人，那些人在當下的言行與心理，從而讓我們更完整圓融。

閱讀有關國際會議、外交條款的論文時，裡面的談判者常常只像是一個個名字，他們個性如何，則幾無描寫。當然，論文不是傳記，問題在我沒有把背景功課做足；只是，我還是比較希望看到如某些思想史論文那樣能觸及主題人物血肉與靈魂的研究。希望我能在往後的報告中做到這一點。

* * *

寫這封信的這幾天，恰逢西藏發生暴動，台灣媒體一開始都承襲西方觀點的報導，然而很快地，網路開始轉貼中立的從學術出發的評論與專著，如王力雄的文章；再不久，學者如王明珂先生也在報上撰文，作了中肯而深入的介紹，網上的反應也不惡。這些說明，我們的人民對口號與種種一面之詞的警惕心，是增強許多——簡單的民族主義或自由主義的大旗，沒有那麼能夠驅動人了。雖然也還有很多人會被簡單地感動、驅動，也總有些自媚媚人的政客之流見得到災害就消費，然而感謝他們：是他們的過度消費，讓學術的價值與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漸漸抬頭。我們歷史研究的當代性，大概也就在這裡了。

我曾改譯克羅齊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為兩句詩：「凡史皆當代，隨人更意旨」，共勉。

胡又天 2007.3.12 - 3.22

(本期完)